

# 对文化人格的多元探讨

## ——对余秋雨散文主题的文化解读

耿丽华

(长春理工大学 教务处,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 在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余秋雨将文化人格作为其创作的基本主题,对文化人格进行了全面的探索 and 深刻的反思,这对新的历史机遇下的中华民族意义非凡。本文试从余秋雨散文中健全文化人格的三个层面:独立自主、刚健有为、面向未来,对文化人格进行追溯、思索与展望,力图构建出既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又具备良好的现实生存素质,并且拥有未来宏观视野的健全的文化人格。

[关键词] 余秋雨;文化人格;传统积淀;生存素质;文化视野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5)04-0168-04

当今中国,正面临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挑战面前,重铸健全的文化人格成为关系到能否继往开来的基础课题。作为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梳理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汰选自己构筑中华文化人格的块块基石,以知识者的深广与博大悉心构建着中国当代文化人格的蓝图。

“人格,是指个人的心理面貌和心理格局,即各种稳定而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sup>[1]</sup>所谓文化人格,则是文化积淀在个体身上表现出的心理规范和行为规范。荣格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个人的文化,最后成为‘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sup>[2]</sup>上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面对国势衰颓、列强环伺的时局,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已注意到国民集体人格的重要性。“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藉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后足以自存,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个人之人格然,国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令梁启超等人痛心疾首的是,他们发现,在国人的群体人格中有许多

“劣下之根性”<sup>[3]</sup>,从而提出了“改造国民之品质”<sup>[4]</sup>这一宏大的思想和文化命题。当中国的历史由近代进入现代,“改造国民性”在陈独秀、鲁迅等人那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余秋雨认为:“人,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会从文化的内涵里突然感到自己的职责,这部分人被称为‘具备人格的人’。”<sup>[5]</sup>

余秋雨沿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先行者的轨迹,在他的系列散文中始终关注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人的文化人格应如何建构的问题。他所构建的健全文化人格,是秉承着传统文化精髓,具备现实生存所需的良好素质,并且具有面向未来的宏观视野的文化人格。借用他在《上海人》中的说法,即是“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sup>[6]</sup><sup>146</sup>

### 一、独立自主的文化根脉

独立自主是余秋雨笔下健全文化人格的第一个层面,因为自主是健全人格的基础,独立是文化人格的底线。人不可能脱离文化和社会而存在,但任何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个人又必须在

[收稿日期] 2015-04-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3YJA751061)。

[作者简介] 耿丽华(1964—),女,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教务处副研究员。

其中寻找到体现自己自由意志的空间,正如人类学家基辛所指出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工具性连环(instrumental linkages),即实现文化所推崇的目标的行为策略。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内心构思一幅路线图,以穿越生活的迷津,迈向自己的道路。”<sup>[7]</sup>

中华文化的长河源远流长,但也泥沙俱下。综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天命观念、中庸之道、伦理与大一统思想限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传统伦理观念在谋求现实社会的伦理实现的同时,否定了个体生命的合理发展。在《十万进士》中,余秋雨深入分析了“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sup>[8]240</sup>,将在其钳制和挤压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灵魂的扭曲、孱弱触目惊心地带现在我们面前。在《历史的暗角》中,余秋雨为中国专制历史所滋生的一类阴暗的角色——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的“小人”造像。他指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质量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sup>[8]308</sup>这些“小人”貌似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如鱼得水,处处掌握主动,实则作为中国专制历史的产物,他们的生存必然依附于黑暗的专制制度。

当我们正视历史,独立自主的人格似乎被民族集体人格所淹没,虽不曾消亡,但也没有律动出多少光芒。因为缺失,所以珍贵,因为珍贵,所以大声疾呼,而余秋雨先生对独立自主人格的呼唤又独具匠心。

首先,他探寻着孕育独立自主人格的精神土壤——生命的本体意识。为此,他展现了一个涵盖社会各层次的具有闪光人格的群落。这中间有以血的代价树立起诚信形象的老信客(《文化苦旅·信客》);有躲在乡村教书育人挣脱“牌坊命运”的女教师(《文化苦旅·牌坊》);有以本体意识与正统人格结构形成对峙的苏小小;有以人文意识向道德化身“雷峰塔”进行挑战的白娘子(《文化苦旅·西湖梦》);更有以反抗魏忠贤和职工大暴动冲击专制制度的苏州百姓(《文化苦旅·白发苏州》)。他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从他们身上都折射出生命的本体意识和朴素的独立人格。从个体性的反抗到群众性的冲突,余秋雨先生证明了生命本体意识于普众层面的存在,从而奠定了独立自主人格在华夏大地上得以张扬的坚实基座。

其次,余秋雨显扬着蕴积在文人身上的独立自主人格。他理性地洞悉:传统社会下的文人

“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sup>[9]</sup>,文人或是处在一种多方依附的状态,依附皇权、依附礼教;或是为了摆脱依附而与世隔绝,自吟自唱、自娱自乐。然而总有一些人会穿过黑夜,开始用黑色的瞳孔打量世界,寻找光明,彰显出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

“突围”的苏东坡就是余秋雨笔下的一个典范。苏轼的一生是对独立自主人格的最佳诠释:不对钦定的统治思想无条件认同,而力求独立思考;把经过主体思考的社会公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进而对社会改革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仗义执言为党人倾轧而不屈,坚持己见为小人构陷而不悔;“乌台诗案”不能打垮他的精神世界,反而为他涤荡了人生的喧闹,帮他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的一生不论穷达祸福总把纯任自然和入世功业同时作为人生践履的内容。穷达,皆存独善之心而又行兼济之志。在济世救民之时,保持着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无私无畏使得入世济民有了更强大的精神支柱;超然物外之际,又怀揣着一颗兼济天下的雄心,心怀苍生使得他的超脱不再曲高和寡。

最后,余秋雨高度肯定了孤独的气质,将其视为独立自主人格所达至的独到境界。余秋雨仍将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苏东坡作为此种境界的杰出代表。“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使他成熟,成熟之后这种孤独又内化为挥不去的气质。”<sup>[8]123</sup>的确,成熟就会孤独,崇高就会孤独,超凡就会孤独,孤独得太久便成了主体的气质。气质是人格沉淀的外化,余秋雨所谓孤独的气质,不是愤世嫉俗的孤傲,不是遗世子立的清高,而是源自文化责任和使命感之下守望者坚守的距离。有了这个距离,就难免孤独;然而有了这个距离才有守护人生永恒价值的勇气,才有瞭望人类精神生活走向的眼光。

中华文化历经风雨却生生不息,究其根系,独立自主必是一脉。然而独立人格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萎缩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余秋雨先生才从本体意识一直追寻到孤独气质,不遗余力地为我们申述独立自主的可行,树立独立自主的榜样,昭示独立自主的方向。我们从中不难体悟出独立自主人格之于民族的意义,但也觉察到坚守独立人格的艰难。当然,关于如何面对艰难正是余秋雨先生所探讨的健全文化人格的又一层面。

## 二、刚健有为的生存素质

刚健有为是余秋雨笔下健全文化人格的第二个层面。它是独立自主人格的保障,也是独立自主人格的延展。

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伴随着对个体人格的强烈异化。余秋雨洞悉强权暴力对个体人格的戕害。在《流放者的土地》中,余秋雨历数中国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所使用的惨无人道的打、杀、流放等酷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它“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sup>[8]71</sup>。面对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生存环境,在夹缝中思想的人们只有以刚强有为作为与权力话语对抗的精神城池,尽管有时常显得苍白,但对个体生命而言,却是在权力系统中唯一健康的生存策略。透过余秋雨的笔端,那些历经沧桑却依然坚挺的人格形象纷纷清晰。他们中有文人、有仕者,有百姓、有官宦。虽然荣辱存亡的大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虽然屡遭贬谪、关押、充军、流放,但他们都在绝望中依靠刚健的禀赋最终走出了肉体上的痛苦,获得了精神上的涅槃。被罢官的朱熹,以教化天下为首义,以哺育英才而欣然,用一生的执着为中华文化守住了一座千年庭院(《山居笔记·千年庭院》);历经战火与偷盗等磨难的范钦家族,依凭着忠于文化良知的刚健人格,执着坚韧地守护、流布着天一阁的精神宝藏(《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更令人钦佩的是,那些身临绝境却依然在流放地撒播文明的贬官谪臣,“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sup>[8]77</sup>他们或则得到了对生命的重新体悟,或则在冰天雪地里留下生死友情,或是融入了蛮荒之地从此生生不息。在步过人生的大关隘后,他们都以刚健的人格力量留下了高大的身影。

当然,内心强健的意义最终还在于“有为”,即强烈社会责任感下的身体力行。正如余秋雨笔下的李冰父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巴蜀文化千百年来由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受到浸泽(《文化苦旅·都江堰》)。如果说刚健是面对现实压力的人格“坚守”,那么有为就是坚守之后的有力“出击”。进退之间方显智慧,也使得独立人格的话语系统进一步圆满。

然而余秋雨并没有满足于此。《山居笔记·天涯故事》又为实现健全文化人格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补充,这就是海南文化所体现的女性文明、

家园文明。它曾使胡铨、苏轼、邱浚、海瑞们修静了心境;它消解波澜继起的中华文化中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浮夸的热情、过于铺张的排场;它“堵住非人文的工业噪音”,“删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sup>[8]223</sup>,进而使刚健有为的文化人格更具韧性,也更具现实性。她们为健全人格的诉求提供了放远与回归的大本营。这对处于躁动而急切的现实境遇下的人格塑造,是一种可贵的润泽和有力的缓冲。

## 三、面向未来的文化视野

如果说在文化人格的建设中,独立自主属于传统价值确认的环节,刚健有为指向生存策略的考量,那么余秋雨所关注的文化人格的第三个层面则是他为国人面向未来而做的长远设计,因此它更具现实意义。视野有多宽广,脚下的道路就能延伸出多远。面向未来的文化视野,当是健全文化人格中意味深长的部分。在对东西方大陆文明的兴亡作了深刻比对和体悟之后,余秋雨把健全文化人格的未来视野指向了海洋文明所凝聚的开放与创新。余秋雨所说的海洋文明,不单是汇通万千的物质优势,更在于物质优势之上凝聚成的包容并蓄、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在《都江堰》中,余秋雨开篇即直言:“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在他眼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其所代表的正是封闭、保守的农业文明的人格特征,与之不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sup>[10]</sup>,其所体现的跃动的生命力和宽广的胸襟正是海洋文明及其孕育的人格形态的近亲。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乡土田园寄予了更多的认同和赞赏,这体现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影响下的人格形态,余秋雨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热情地赞美了体现海洋文明的城市人格形态。在《上海人》开篇,余秋雨热切地显扬了在海洋文明的熏陶下,上海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心理秉性——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意识。正是上海人宽容的秉性,铸就了上海今天的繁荣;正是上海人开放的视野,使上海成为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紧接着,他又在“上海文明”与“京兆心态”的比对中突显出海洋文明勇于开创的精神优势。同时,他也理性地裸呈着上海文化人格中的暗疮:过分精细导致的狭隘,过分自我导致的排外,过分的比较导致的欲望与失落……然而这些,并非海洋文明自身的派生物,而正是因为对海洋文明精神内核的淡忘才

招致的附着物。余秋雨迎难而上,明确提出要想续写上海新的历史篇章,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他再一次具体地为上海形象进行整体设计,针对上海人格中的狭隘与自我膨胀,他强调上海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指出它所依凭的应是“大海、世界、未来”<sup>[6]159-161</sup>。当然,这些观点不应被看作仅是对上海文化建设的展望,也是对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期冀。有了宽容,万千文明才能“走进来”;有了开创,华夏文明才能“走出去”;有了宽容与创新的未来视野,中华民族才能“走下去”,并将一路“走下去”。

余秋雨关于宽容博大、开拓创新的海洋文明的建构,呈现着中华文化面向未来的思考。它使独立自主和刚健有为的文化人格力量在历史的延展中更具有穿透力与衍生力,它们三者间的互渗与互动,从气禀、意志、胸怀三个维度成功地支撑起一个健全文化人格的理想架构。

#### 四、结 语

余秋雨对中华文化人格的追溯是冷峻的,对文化人格的展望是热切的,因为他对民族未来期冀是赤诚的。他笔下的文化人格,由修炼内功而走向应对世事,由面对现实而走向包容未来,由

沉潜、内蕴而走向外向、开放,这将是民族文化人格在新时期的无限延展。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遗余力地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关健全文化人格的丰厚内涵,这对处在社会转型期和新的历史机遇下的整个民族来讲,无疑是有益于守住精神的港湾和撑起远航的桅帆。

#### [参 考 文 献]

- [1] 程志强,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744.
- [2] 荣格. 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A]. 冯川,等,编译. 心理学与文学[C]. 上海:三联书店,1987:223.
- [3] 梁启超.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A]. 吴松,等,点校. 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C].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701-703.
- [4] 梁启超. 饮冰室诗话[M]. 舒芜,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8.
- [5] 我做文化学者贡献更大——记者与余秋雨面对面. www.zjol.com.cn. [2005-11-25].
- [6] 余秋雨. 上海人. 文化苦旅[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
- [7] 基辛. 文化·社会·个人[M]. 甘华鸣,等,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23.
- [8] 余秋雨. 山居笔记[M].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
- [9] 何滋全. 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条主流. 中国文化六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64.
- [10] 余秋雨. 都江堰. 文化苦旅[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273.

### The Multi-dimensional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in Yu Qiuyu's Prose

GENG Li-hua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In his prose series *The Bitter Trip of the Culture*, *The Notes of Living in the Mountain*, Mr. Yu Qiuyu carried out an all-round exploration on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as the main theme of his pros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Chinese nationality facing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retrospection as well as an expectation of cultural personality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cultural personality presented in Mr. Yu's prose, which include: independent cultural personality, vigorous cultural personality, and promising cultural personality. In doing this, the author tries to construct a perfect cultural personality which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ssence, possessing the reality survival quality, and owning the promising macroscopic cultural vision.

**Key words:** Yu Qiuyu; Cultural Personality; Traditional Essence; Cultural Vision

[责任编辑:张树武]